

大學生親職化現象、個體化程度與身心健康指標之相關研究*

陳慧珊

臺北市立松山高級中學
輔導室

吳麗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本研究旨在探討大學生(1)不同性別、出生序之大學生親職化現象差異；(2)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指標的關係；(3)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的關係。本研究採立意抽樣從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中，抽出 287 名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所使用的研究工具包括「親職化量表」、「個體化量表」與「一般健康量表」。本研究主要發現如下：(1)不同性別之大學生的親職化現象有顯著差異，差異主要表現在「不公平性」上，且男性高於女性。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的親職化現象有顯著差異，差異主要表現在「功能性照顧」上，且老大高於老么。(2)大學生的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呈現出大學生若表現出較少的「功能性照顧」、較多的「情感性照顧」以及較多的「不公平性」，其身心狀況就越不健康。(3)大學生的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之間有二個關係組型存在。第一組的關係組型呈現出大學生有高度不公平感受時，雖外表獨立堅強、其內心仍感衝突矛盾與不平，亦即大學生有高度不公平感時，雖其外的行為在功能、態度和情緒上表現獨立自主，但心理與父母情感分離的衝突仍是大的。第二組關係組型主要呈現出當大學生擔任較多照顧家人的情緒責任時，則其個體化程度較低。

關鍵詞：大學生、身心健康、個體化、親職化

一、親職化的定義與內涵

「親職化」(parentification)現象是指在家庭中父母與孩子角色轉換(role reversal)的歷程，孩子成為家中的「照顧提供者(caregiver)」。親職化現象照顧者角色的表現主要包括兩種照顧的形式：1. 功能性照顧：孩子必須擔負家庭生計的維持和生理上的照顧責任。例如：照顧弟妹、負責購物、煮飯、洗衣等，這部分的角色較容易被定義與被看見；2. 情感性照顧：孩子必須照顧家庭

* 1.本篇論文通訊作者：陳慧珊，通訊方式：hueisan410@gmail.com。

2.本論文係陳慧珊提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之碩士論文的部份內容，在吳麗娟老師，林世華老師指導下完成。衷心感謝林世華教授提供許多統計上的協助，特此致上最深的感謝。

成員情緒上的需求，而且把家當成是一個整體。例如：扮演父母親的紅粉知己、同伴、拯救者、調停家庭的衝突、提供情緒的照顧和支持等。情感性的親職化現象被認為對孩子的健康有較大的威脅，且更容易威脅到個體的幸福和權益 (DiCaccavo, 2006)。此外，Jurkovic (1997) 認為孩子承擔長期的照顧責任且持續的時間較長時，會感受到不公平與不被支持的感受，因此 Jurkovic (1997) 指出「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為親職化現象的三大內涵並以此發展出親職化量表 (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本研究的親職化現象即是採用 Jurkovic 對親職化的定義，並根據石芳萌 (2007) 之修訂作為本研究之研究工具。

然而，東、西方的社會對於親職化現象的認定與解讀是否存在相同的角度呢？Stein、Rotheram 與 Lester (2007) 提出親職化現象的認定有文化取向上的差異：在集體主義的文化裡（如拉丁人、非裔美國人），親職化現象被認為是一個文化適當性的行為，以非裔美國家庭的價值觀為例，其強調相互依賴和可變通的家庭角色。因此在探究親職化的適應與不適應時，也應放在不同的文化架構下思考。

在華人社會中，子女擔負與協助家務工作和體貼父母的現象是較為常見的。張虹雯 (1999) 指出，在台灣社會裡，子女在家中承擔家事、孝順父母、照顧兄弟姊妹等行為是被父母、師長或大眾所讚許的，而且做愈多表示愈孝順。葉致芬 (2004) 進一步研究國內孝行獎年輕得主的身心狀態指出，這些孝行獎得獎者大多處於困頓的家庭之中（例如：單親、隔代教養、家庭成員患有某種疾病或身心殘障、貧窮和社經水準低落等）協助家務，承擔家中責任。但若進一步探究孝悌楷模孩子的心理，會發現這些孩子主動或被動的為父母或家庭挺身而出、承擔家事、孝順父母和照顧兄弟姊妹，這些被稱許的行為，是犧牲自己的需求和利益，以近似親職化現象的方式來平衡或拯救家庭，將進一步造成其手足關係疏離、減損身心健康、減低學業成就或影響日後親密關係。

從上述研究中看到，在華人文化中，孩子對家務的協助有著被期待與被需要的看法，但華人子女承擔家務與照顧家庭的責任是否與西方的親職化現象是相似的概念尚有待進一步討論與釐清。葉致芬 (2004) 亦認為不能夠武斷的將西方家庭系統的親職化觀點套在華人的孝道文化上，來污名化孝道行為的意義與功能。

二、親職化現象與不同性別和出生序的相關研究

Patricia (2010) 指出孩子在家庭中提供照顧的行為，其中性別、出生序和年齡等扮演重要的角色。男孩與女孩從出生開始，就扮演不同的角色與受不同的行為準則規範，因此也被賦予不同的期待。Arnold 與 Kuo (1984) 指出，父母對子女之孝道責任的期待存在著性別差異，例如：父母期待兒子能傳承家族、提供財務實際上的協助與支持、陪伴；女兒則被期待協助家務以及陪伴父母親。然而，過去國內、外相關研究對於親職化現象是否存在性別差異，並未出現一致性的結論。如 Patricia (2010) 認為青少年比青少年對家庭提供較多的照顧時間；Jurkovic (1997) 指出女孩圍繞著家庭成員的需求，是缺乏自主性的，所以女孩比男孩更容易遭受到破壞性親職化現象的不利影響；Earley 與 Cushway (2002) 認為親職化現象與女兒的低自我認同有關，推論女性較無能力去探索他們自己的需求而去迎合父母的需求。而石玲惠 (2004) 對國小高年級學生的研究卻指出親職化現象對男性存在負向影響，讓男孩有較多的情緒困擾。

然而，近年的研究結果中，常看到親職化現象並沒有性別上顯著的差異。例如，石芳萌 (2007) 使用親職化量表，針對台灣高中生進行研究，發現親職化現象並無性別差異；Godsall、Jurkovic、Emshoff、Anderson 與 Sanwyck (2004) 使用親職化問卷成人版 (PQ-A)，針對 10~18 歲酗酒家庭的孩子進行研究，結果顯示親職化現象並無性別的差異。而 Jurkovic、Thirkield 與 Morrell (2001) 利用 FRS-A 量表，針對美國離婚家庭的大學生進行研究，亦發現親職化現象並無性別差異的結果。綜上所述，親職化現象是否有性別上的差異，似乎國內外一些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研究者好奇，在我國文化中男、女性扮演不同的角色，深受社會文化不同期待、規範的影響，不同的性別在扮演照顧者角色、在親職化現象上，是否會有顯著的性別差異存在？這會是本研究欲探究的目的之一。

一般而言，家庭中排行為老大的子女，通常被賦予較高的期許，希望家中的長子女對家庭提供較多的協助。廖若君（2004）認為，父母對孩子的出生順序本身有著不同的角色期待，對於不同排行的孩子會給予不同的鼓勵與增強，使得孩子覺得因處於不同的社會環境，發展出對自己及他人不同的態度模式。Burton（2007）的縱貫性質化研究指出，家中經濟困難的長子、女常會扮演被親職化的角色去幫助家庭有更好的適應：家庭中長子會透過負擔家計成為母親的信心來源，長女則扮演處理家務和照顧的角色等。該研究結果除了指出長子、長女較容易呈現出親職化的現象，也分析長子、長女的性別與其分擔的照顧功能也是有所差異。管貴貞（1992）發現在單親家庭裡，排行老大的青少年在面臨家庭轉變的過程中，其心理負擔和憂心程度比其他手足多。此外，石芳萌（2007）針對高中生的研究亦指出排行老大的子女比其他排行的手足對家庭有較多的功能性照顧。華人文化中「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的現象，似乎也在描述長子、女被社會文化賦予較多的家庭責任，而國內的親職化現象是否在不同出生序之間，會有顯著的差異？這也是研究者欲探究的目的之一。

三、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的相關研究

Br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和 Jurkovic（1997）皆認為親職化現象有「破壞性親職化」（Destructive parentification）及「適應性親職化」（Adaptive parentification）兩部分。首先，「破壞性親職化」現象是指孩子過度擔負照顧的角色且無支持的環境時，將損害他們的身心發展，例如：

（一）自我概念

Jurkovic（1997）指出若孩子不適當的在情緒上或發展上擔任家中照顧者的角色，且透過照顧行為去定義自己的存在，他們以照顧者的角色形成自我認同，這些孩子可能難以去接受別人「只」對他這個人有興趣，也無法感覺到照顧自己是重要的。此外，Godsall 等人（2004）與 Byng-Hall（2002）認為親職化孩子可能會將功能性照顧或情感性照顧成為唯一的自我認同來源。Jennifer 與 Rebeca（2007）亦指出過度的家庭照顧行為常會將引起個體對自我產生負向的自我評價。

（二）情緒困擾

文獻顯示出一般被親職化的小孩比較容易感到憂鬱、有自殺感受、低自尊、羞愧、極度的罪惡感、持續不斷的憂慮、社會孤獨和其他身心癥候或行為失序的外在症狀與情緒困擾，但這些情緒困擾的問題常常遮掩了其過度地想成為父母的照顧者的現象。例如：一個有拒學問題的孩子，其問題成因可能是因為孩子太想要照顧父母而產生這些情緒困擾與症狀，但這個影響個體情緒困擾的親職化現象，可能常常未被注意到（Byng-Hall, 2002; Jurkovic, 1997）。

（三）性格發展

文獻中也顯示親職化現象可能影響個體性格的發展，例如，Jones 與 Wells（1996）的研究結果支持了親職化現象可以預測自戀和受虐的性格，這些性格的顯現，常常是保護個體免於自卑感或恐懼失落的一種防衛機轉。

（四）人際關係

Jurkovic（1997）指出當孩子還是孩童或青少年時，親職化現象可能就會影響他的手足關係和同儕關係。幼時的親職化現象對長大後的人際關係也易有深遠的影響，例如：人際上的不信任、對家庭之外的關係連結感到矛盾、涉入不公平和傷害性的關係裡、沒有獨立的能力、永久存在人際動力的循環（像是誤用父母權力的傾向）與成為照顧的角色等（Earley & Cushway, 2002; Jurkovic, 1997; Mayselless, Bartholomew, Henderson, & Trinke, 2004）。

然而，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的關係，除了上述 Jurkovic 所提出的「破壞性親職化」不利個體身心健康的影響之外，親職化現象亦存在著有益適應、有益身心健康的部分。Jurkovic 認為「適應性親職化」是指當親職化現象是短暫的照顧責任，孩子容易從中學會照顧的特質與技巧，並從中獲得自我價值感、被支持與公平對待，這可能有助於他們將來的各項發展，例如：獲得信賴和滿足、責任、獨立、同理心、自尊、情感表達、增進關係彈性的強度、歸屬感、有用感、精熟社會化的技巧和預演未來角色行為的機會。因此，個體的親職化現象，可能有助於個體的身心健康

(Davies, 2002; DiCaccavo, 2006; Earley & Cushway, 2002; Jurkovic, 1997; Mayseless et al., 2004; Patricia, 2010; Stein et al., 2007)。從上述相關文獻發現，雖然親職化現象有諸多不利身心健康的影響，但親職化現象也可能具有助於身心健康的一面。因此，研究者好奇國內個體所呈現的親職化現象與其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為何，這也是研究者想要探究的目的之一。

四、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的相關研究

「個體化」是指在關係（家庭、社會、文化）的脈絡中，個體視自己為個別、獨立個體的內在心理歷程，個體不再經驗自己與他人之間的混淆，也就是重新調整與他人心理依賴關係，並追求個人的分離和連結的歷程，這強調個人的發展歷程，尤其是在人我心理距離、界限與獨立自主的發展（蔡秀玲，1997；Anderson & Sabatelli, 1990）。

Jurkovic（1997）指出當親職化現象是破壞性的影響時，青少年常難以形成獨立的自我感，並且影響個體導致其有較差的身心健康。極端照顧父母及家人的他們，會有離開家庭的困難，例如：一些青少年在離家時，經驗到極度苦惱的罪惡感、羞愧和不忠誠感；儘管離家幾百里遠，他們也盡可能持續的照顧家庭成員，尤其是情緒上的照顧。對大學生來說，如果他們無法從家中獨立出來，常使他們處在危機、憂鬱和自殺行為的狀態中。

然而，Stein 等人（2007）指出親職化現象常常可以幫助青少年去學會照顧自己，獨立生活。Walker 與 Lee（1998）在酗酒家庭的研究中發現，孩子需要承擔起照顧醉酒後的父母、手足起居和家庭事務，在這樣家庭裡的孩子反而因為家庭的不利因素，提早學會處理家庭事務的技能和自我照顧的能力。對這樣的孩子來說，親職化現象反而促進了青少年個體化的發展，讓孩子能在青春前期發展出獨立的功能，有較好的適應能力和較佳的自尊感，去幫助自己的家庭並使自己能夠從家庭裡獨立出來。綜合上述，研究者思考並好奇：在我國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二者的關係為何？這也會是研究者想探討的目的之一。

本研究選取大學生為研究對象，因為大學生正值離開家庭、個體化發展的時期，是適合探討親職化與個體化現象的研究對象。許多文獻指出他們正值發展階段中青少年晚期過渡到成人前期的歷程，其心理上面對著重新檢視親子關係的挑戰；同時也從此一關係中獨立出來，並蛻變為一個成人。對許多大學生而言，這是生命中第一次必須為自己負絕大部分責任的階段（惠風，1995；Teyber, 2011）。此外，國內目前對於親職化相關實徵研究，多以高中、高職及國中之學生為研究對象，大學生的親職化研究並不多見。因此，綜上所述，研究者欲瞭解在大學的階段中所表現的親職化現象、個體化程度與身心健康之間的關係，以及不同性別與出生序的大學生，其親職化現象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具體而言，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 （一）台灣的大學生親職化現象是否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 （二）台灣的大學生親職化現象是否因出生序有明顯差異。
- （三）探究台灣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其身心健康指標的關係。
- （四）探究台灣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其個體化程度的關係。

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公私立大學及技職校院的一到四年級學生為研究對象，抽樣時涵蓋公立的學生，以立意取樣的方式抽出 8 所學校學生共 293 名。當受試者填答完畢後，刪除填答不完全與有明顯反應心向者的量表，獲得有效樣本 287 人，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表，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有效樣本之基本資料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合計
性別	女生	171	59.6%	287 人
	男生	116	40.4%	
年齡	18	16	5.6%	M (平均數) = 20.36 SD (標準差) = 1.4
	19	85	29.6%	
	20	51	17.8%	
	21	76	26.5%	
	22	38	13.2%	
	23	19	6.6%	
	24	1	0.3%	
家中排行	老大	126	43.9%	
	中間子女	45	15.7%	
	老么	94	32.8%	
	獨生子女	22	7.7%	

二、研究工具

(一) 親職化量表 (施測時改稱作「家庭經驗問卷」)

本研究採用石芳萌 (2007) 所修訂的「親職化量表」，以測量大學生的親職化程度的情形，本量表已於 2008 年 11 月獲得石芳萌同意使用。以下介紹本量表的內容、計分及其信、效度考驗：

1. 量表內容與形式

本研究採用石芳萌 (2007) 修訂 Jurkovic 與 Thirkield (2000) 的「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 (FRS-A)」量表，以測量大學生親職化程度的情形。本量表共三十七題，又分為三個分量表，其名稱及意義說明如下：

- (1) 功能性照顧 (instrumental caregiving)：指個體協助與負擔家中事務性家事與雜物的責任，例如：洗衣、採買、賺錢、照顧手足等。本分量表的題目包括：第 1、3、6、8、13、16、19、22、27、29、31 題，共十一題。
- (2) 情感性照顧 (emotional caregiving)：指個體承擔照顧家人情緒的責任，而呈現出與家人情感同步、捲入家庭衝突、超齡成熟等狀態。本分量表的題目包括：第 2、5、9、12、14、17、18、24、26、30、32、34、35、36、37 題，共十五題。
- (3) 不公平性 (unfairness)：指個體感受到自己因承擔照顧責任而感到犧牲、不被瞭解、缺少支持及付出與獲得之間不對等。本分量表的題目包括：第 4、7、10、11、15、20、21、23、25、28、33 題，共十一題。

2. 量表計分方式

「親職化量表」採取李克特式五點量表，反應方式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沒意見」、「符合」、「非常符合」。計分時，除了第 14、15、16、19、21、31 題為反向計分之外，其餘皆採正向計分。三個分量表得分越高，表示個體的親職化現象程度越高。

3. 信度考驗與效度研究

信度方面：石芳萌（2007）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獲得各分量表的 α 係數為 .69 至 .86 之間，各題決斷值介於 5.65 至 21.68 之間。效度方面：石芳萌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將親職化量表用因素分析來考驗量表之構念效度。在探索式因素分析中得到十一個因素，並以因素負荷量 .30 以上的題目作為正式量表所採用的題目。分析發現，因素三、因素五、因素七、因素十與因素十一即為原「功能性照顧」的範圍；因素二、因素四、因素六與因素八即為原「情感性照顧」的範圍；因素一與因素九即為原「不公平性」的範圍；顯示所得之十一個因素在結構上分別隸屬於各個分量表的範圍，三個分量表所含之各個因素彼此間的題項並無混淆。親職化量表採取線性組合分數（linear composite），將各分量表所屬因素的題項，形成各分量表分數。因此，本量表之各分量表上所得之分數，在結構上應有其可接受性。

（二）個體化量表（施測時改稱作「生活經驗問卷」）

本研究採用蔡秀玲（1997）所修訂的「個體化量表」，以測量大學生的個體化程度的情形，本量表已於 2008 年 11 月獲得蔡秀玲同意使用。以下介紹本量表的內容、計分及其信、效度考驗：

1. 量表內容與形式

本研究欲瞭解大學生個體化的程度，乃採用蔡秀玲（1997）依據客體關係理論，並參考 Hoffman 的「心理分離量表」（Psychological Separation Inventory），及 Olver 等人所編製的「人我分化量表」（Self-Other Differentiation Scale）修訂而成的「個體化量表」。本量表共八十六題，又分為五個分量表，其名稱及意義說明如下：

- （1）功能獨立（functional Independence）：指個體不需要父母的協助，而能自己處理事情。本分量表題目包含：第 5、10、14、19、24、33、38、43、47、52、57、61 題，共十二題。
- （2）態度獨立（attitudinal Independence）：指個體與父母在信念、價值觀與態度等方面的不一致。本分量表題目包含：第 4、9、13、18、23、28、32、37、42、51、56、60、65、66、69、72 題，共十六題。
- （3）情緒獨立（emotional Independence）：指個體不需過度需求父母的贊同、親密與情緒支持。本分量表題目包含：第 1、3、11、12、16、22、29、31、35、39、41、45、48、50、54、58、63、67、70、73、75 題，共二十一題。
- （4）衝突獨立（conflictual Independence）：指個體和父母的關係中並沒有罪惡感、怨恨、焦慮和生氣等負向情緒。本分量表題目包含：第 2、6、7、8、15、17、20、21、25、26、27、30、34、36、40、44、46、49、53、55、59、62、64、68、71、74 題，共二十六題。
- （5）人我分化（self-Other Differentiation）：指個體在人我關係中能維持自我感，也就是人我界限清楚，有獨立的自我感。本分量表題目包含：第 76、77、78、79、80、81、82、83、84、85、86 題，共十一題。

2. 量表計分方式

「個體化量表」採用李克特式五點量表計分方式，反應方式為「從未如此」、「偶爾如此」、「有時如此」、「常常如此」、「總是如此」，全量表皆採反向計分，意即「從未如此」代表 5 分，「總是如此」代表 1 分，總量表及各分量表之得分越高表示個體化的程度越高。

3. 信度考驗與效度研究

信度方面：蔡秀玲（1997）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因素分析，得到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84 至 .89 之間。效度方面：蔡秀玲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建構效度的因素分析，顯示各題題項的因素負荷量皆達顯著，表示符合建構效度。其中「功能獨立」因素負荷量介於 .39~.75；「態度獨立」因素負荷量介於 .420~.77；「情緒獨立」因素負荷量介於 .29~.77；「衝突獨立」因素負荷量介於 .14~.76；「人我分化」因素負荷量介於 .49~.73。

(三) 一般健康量表 (施測時改稱作「身心健康問卷」)

本研究採用張珣 (1987) 所修訂的「一般健康量表」, 以測量大學生的身心健康的情形, 本量表已於 2008 年 11 月獲得張珣同意使用。以下介紹本量表的內容、計分及其信度考驗:

1. 量表內容與形式

本研究乃就大學生的身心健康狀況作廣泛性討論, 而不針對某一向度之生理或心理狀態作深究, 因此採用張珣 (1987) 參考英國 Goldberger 一般健康量表所翻譯及修訂的「一般健康量表」來測量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情形。本量表的目的在瞭解個體最近的身心健康情形。本量表共二十八題, 又分四個分量表, 其名稱分述如下:

- (1) 身體症狀 (somatic symptoms): 指個體生理上的不舒適與身體病症的出現, 例如: 頭疼、疲倦、生病等。本分量表題目為第 1~7 題。
- (2) 焦慮與失眠症 (anxiety & insomnia): 指個體情緒上出現易緊張、不安, 與睡眠狀況不佳的情形。本分量表題目為第 8~14 題。
- (3) 社會功能障礙 (social dysfunction): 指個體對日常需處理的事項感到無法滿意與勝任。本分量表題目為第 15~21 題。
- (4) 嚴重憂鬱症 (severe depression): 指個體對自己與生活感到悲觀、無望感, 與有自傷意念的出現。本分量表題目為第 22~28 題。

2. 量表計分方式

「一般健康量表」採李克特式四點量表計分方式, 張珣將此量表改為李克特式五點量表, 反應方式改為「完全沒有」、「比往常少」、「與往常一樣」、「比往常多」、「比往常較多」。總量表及各分量表之得分越高表示身心健康狀況越差。

因其他研究者使用本量表時, 曾表示受試者在「完全沒有」及「與往常一樣」兩者間的反應選項感到混淆, 因此本研究參考石芳萌 (2007) 的方式, 加註「◎請注意: 此部分選項中所指的『往常』, 是指與您同年齡的同學們平時的表現, 請依照您實際狀況與他們相較後的程度來填答。」, 協助受試者瞭解自己與一般同年齡者身心健康的差異, 而非受試者與自己相較的身心健康差異。

3. 信度考驗

王珮玲 (1987) 以國中生為對象, 進行因素分析, 得到同於原量表的四個因素分類, 並求出全量表的 α 係數為 .95, 四個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84 至 .92 之間。

蔣桂嫻 (1993) 以高中生為對象, 進行項目分析, 各題項之決斷值介於 5.65 至 17.86 之間, 且均達 .001 的顯著水準。在內部一致性分析中, 總量表的 Cronbach α 係數為 .81, 四個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47 至 .72 之間, 隔兩週之重測信度為 .85。

石芳萌 (2007) 以高中職學生為對象, 在量表加註「◎請注意: 此部分選項中所指的『往常』, 是指與您同年齡的同學們平時的表現, 請依照您實際狀況與他們相較後的程度來填答。」後, 重新考驗信度值, 各題的決斷值介於 14.47 至 39.72 之間, 四個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85 至 .91 之間。

三、施測程序與資料處理

研究者先以電話聯絡所欲施測的大學授課教師, 說明施測目的、施測價值, 溝通相關事宜。以班級為單位, 同時進行三個量表的施測, 由研究者或由受過心理測驗相關訓練的施測者到該班級進行施測, 施測時間約為 20-30 分鐘。量表回收後, 刪除作答不完全及有明顯反應心向者的量表, 將有效量表的資料輸入電腦, 以 SPSS16 for windows 進行各項統計分析。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不同性別、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現象的差異情形

(一) 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親職化現象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爲了探討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親職化現象的差異情形，以親職化量表的三個分量表爲依變項進行多變項變異數分析。所得結果爲：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的各個分量表「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不公平性」三項得分具有顯著差異 ($F = 4.38, p < .05$)，進一步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比較各個依變項之差異情形，結果可知，「不公平性」的得分達顯著 $F(1, 285) = 12.04, p < .05$ ，且男生 ($M = 27.22$) 顯著高於女生 ($M = 24.15$)。在「功能性照顧」(男生 $M = 26.35$ 、女生 $M = 26.74$) 與「情感性照顧」(男生 $M = 44.80$ 、女生 $M = 44.64$) 方面的表現，不同性別之大學生則沒有明顯的差異。

上述研究結果可能顯示出大學生知覺到協助與負擔家中事務性家事與雜物的責任(例如：洗衣、採買、賺錢、照顧手足等)、提供家人心理上和情感上的照顧責任與感受到自己因承擔照顧責任而感到犧牲，且覺得自己不被瞭解、缺少支持、付出與獲得之間不對等；男女大學生有性別上的差異，而且男性大學生比女性大學生更感到自己不被瞭解、缺少支持以及付出與獲得間是不對等的。

本研究進一步由比較平均數瞭解到性別差異顯示在「不公平性」上面，且男性大學生的不公平感受高於女性大學生。Tatjana 與 Gabriele (2010) 的研究指出男性照顧者若其照顧行爲對其精神上造成損害，則呈現出較多壓力反應和心理上的衝擊。傳統認定男性爲「一家之主」，男性可能也覺得應該要爲家庭付出與照顧家庭，但男性大學生的不公平感覺卻多於女性大學生，此可由 Braverman 等人 (1995) 認爲男性角色衝突的來源與壓抑情感有關來解釋，也有可能是因爲「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刻板印象，使得男性在情緒表達的部分較爲壓抑。除此之外，邱秀燕 (2000) 研究指出男性通常力求減低恐懼、受傷、愧疚等情緒的感受，不把情緒表達出來。當男性大學生擔負起家中的照顧責任卻被當成是理所當然的付出，或是男性一向較不習慣表達情緒的特質，此長期累積負向情緒的結果可能使得男性將不公平的感受壓抑在心裡，因而比女生累積較多不公平的感受。

反觀女性，劉芳助(1999) 認爲在傳統文化思想體系中，女性對自我的定位是放在一個「照顧者」的角色之下，換言之社會文化對女性擔任照顧角色有較高的期待，加上性別刻板印象覺得女性「應該」爲家庭付出多一點，就像 Mayselless 等人 (2004) 認爲可能是父母對女孩的期待較高，而且女孩較易理解父母提出的家務要求，所以較容易成爲家庭中的照顧者。Fullinwider-Bush 和 Jacobvitz 在年輕女性認同 (identity) 發展的研究指出，女性常較無能力去探索他們自己的需求 (引自 Earley & Cushway, 2002)。因此，對女性大學生來說，他們的自我認同裡，部分接受了社會對女性的期許，讓女性大學生有著「應該」成爲照顧者的想法，所以可能較不會覺得不公平。此外，也可能是因爲女性較人際取向，較習慣以情感層面去照顧他人，也較習慣使用語言在人際關係裡去傾吐自己的情緒。在傾吐情緒的過程中，能讓照顧角色的甘苦經驗被理解與抒發，使得女性可能較不會覺得不公平。總之，女性被認爲「應該」照顧家庭之外、習慣成爲情緒照顧者、較習慣宣洩情緒、較無能力去探索自己的需求以及從照顧他人的責任裡產生自我肯定等，可能是讓女性較不會感到那麼不公平的原因。

另外，雖然本研究結果顯示在親職化現象上，「性別」變項有顯著差異，但由於本研究在施測抽樣時的有效樣本中男、女比例出現不均衡的分佈 (男：女 = 116：171)，這可能會限縮了本研究結果推論的範圍。日後爲了更能有效地推論研究的結果，在男、女性別樣本比例上的分佈，應該使其更加均衡。

(二) 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現象的差異情形

本研究爲了探討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現象的差異情形，以親職化現象的三個分量表爲依變項進行多變項變異數分析。所得結果爲：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在親職化量表的各個分量表

「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不公平性」三項的得分具顯著差異 ($F = 2.59, p < .05$)，進一步以事後比較瞭解各依變項之差異情形，結果顯示，「功能性照顧」的得分達到顯著差異 $F(3, 283) = 5.29, p < .05$ ，且老大 ($M = 27.99$) 顯著高於老么 ($M = 24.90$)，而老大 ($M = 27.99$) 與中間子女 ($M = 27.49$)、老大 ($M = 27.99$) 與獨生子女 ($M = 25.82$) 在「功能性照顧」上的差異並不顯著。此外，在「情感照顧」與「不公平性」方面的表現，不同出生序之大學生的差異是不顯著的。

本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在家庭中擔任照顧的角色在不同出生序上是有差異的：家中排行老大的大學生在協助與負擔家庭中事務性家事與雜務的責任，略高於在家中排行老么的大學生。本研究結果似乎與下述的研究結果一致：石芳萌 (2007) 認為可能是老大或中間子女出生且年幼時，大多處於父母剛創業和婚姻初始階段，需要孩子家務上的協助，使得老大和中間子女較容易成為父母的小幫手，分擔父母的家務和照顧弟妹的責任，因此較容易有較高的親職化現象。此外，Burton (2007) 亦指出家中經濟困難的長子、女可能常會需要扮演親職化的角色去幫助家庭有更好的適應，其進一步分析了長子、女的性別與其分擔的照顧功能也是有所差異，例如：家庭中長子可能需要透過負擔家計或成為母親的信心來源；而長女可能需要在家庭中呈現處理家務和照顧的角色，來分擔照顧的功能。廖若君 (2004) 指出長子、女常被父母期望參與較多家務工作，除此之外，長子、女對自己是手足之長此角色的認同，也常認為自己應該參與較多的家務工作。因老大為家中手足間較早成熟的孩子，父母常會先教導老大有關家務性工作的處理方式，並期待家中老人在父母工作忙碌之餘，可以分擔家務責任並成為其他手足的楷模。此外，老大有時也會受父母之託，去照顧比自己年紀小的手足，讓父母得有喘息的空間。在華人社會中「長兄如父、長姐如母」的觀念，使得老人在傳統文化的期待下，常需要負擔較多的照顧家庭、手足和分擔父母家務的責任。

然而，在家庭中排行中間子女 ($M = 27.49$) 和獨生子女 ($M = 25.82$) 的大學生，在功能性照顧上並沒有顯著差異。這樣的結果也有可能是研究者在抽樣時，受試者在家中排行中間子女 ($N = 45$) 與獨生子女 ($N = 22$) 的人數比在家中排行老大 ($N = 126$) 和老么 ($N = 94$) 的人數較少的原因有關。

二、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指標之典型相關結果

本節主要分析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指標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分別以親職化量表之「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作為 X 組變項，以一般健康量表之「身體症狀」、「焦慮與失眠症」、「社會功能障礙」與「嚴重憂鬱症」作為 Y 組變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其結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學生親職化量表各分量表分數與一般健康量表各分量表分數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χ_1	χ_2	χ_3		η_1	η_2	η_3
功能性照顧 (X_1)	-.30	.95	.07	身體症狀 ($Y1$)	.44	.28	.71
情感性照顧 (X_2)	.34	.62	-.71	焦慮與失眠症 ($Y2$)	.79	.45	.15
不公平性 (X_3)	.61	.53	.59	社會功能障礙 ($Y3$)	.84	-.28	.13
				嚴重憂鬱症 ($Y4$)	.77	-.01	.53
抽出百分比	.19	.52	.29	抽出百分比	.53	.09	.21
重疊百分比	.02	.01	.001	重疊百分比	.05	.001	.001
ρ^2	.09	.02	.004				
ρ	.30*	.13	.06				

* $p < .05$

表 2 結果顯示，第一對典型變項之相關達顯著水準 ($\rho_{\chi_1\eta_1} = .30, p < .05$)，然而，從典型相關強度指標 ρ^2 為 .090 來看，第一對典型變項間的彼此強度不顯著。典型變項 χ_1 與「功能性照顧」、「情

感性照顧」及「不公平性」分量表分數的相關係數分別為-.30、.34 和 .61；典型變項 η_1 與「身體症狀」、「焦慮與失眠症」、「社會功能障礙」及「嚴重憂鬱症」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44、.79、.84 和 .77。從兩側典型結構係數來看，典型變項 χ_1 與「不公平性」分數呈現高度的正相關，與「情感性照顧」分數呈現中低度的正相關，但與「功能性照顧」分數則呈現中低度的負相關。而典型變項 η_1 與每一個身心健康指標分數均呈現高度的正相關。

從關係的方向上來看，典型結構係數 χ_1 除了「功能性照顧」為反向關係外，其餘係數皆呈現正的走向，再加上典型相關係數必然是正的，可以推知左側親職化各分量表除了「功能性照顧」與右側身心健康各指標呈現負的關係，也就是相反向的關係；其餘左側親職化分量表「情感性照顧」和「不公平性」與右側身心健康指標各個分數是成正的關係，也就是同方向的關係。

再從結構上看，典型變項 χ_1 概念上與國外所定義的親職化概念有所不同。國外學者所定義的「親職化」是指個體所測出的三個分量表的方向是一致的：同時具有高功能性照顧、高情感性照顧、高不公平性，才稱之為親職化（另為行文方便，之後皆以「國外親職化」現象稱之），然而本研究親職化三個分量表的方向是不一致的。因此，嚴謹的來說，第一對典型變項 χ_1 與 η_1 間的典型相關係數並無法在概念上直接稱說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指標之間有顯著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無法支持國外所謂親職化現象（同時具有高功能性照顧、高情感性照顧、高不公平性）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但本研究呈現出的結果是：大學生若表現出較少的「功能性照顧」、較多的「情感性照顧」以及較多的「不公平性」，其身心狀況就越不健康。換言之，當大學生分擔事務性家事與雜務的責任較少、情緒性照顧的責任較多，卻又感到自己不被瞭解、缺少支持、以及付出與獲得之間是不對等的時候，其身心症狀就會比較多。此研究結果反映出高情感性照顧與高不公平性，可能與較差的身心健康狀況有關係。

本研究結果與石芳萌（2007）所指出的結果類似：研究結果皆發現「情感性照顧」和「不公平性」與身心健康有較密切的關係。這讓研究者思考，是否國內照顧的內涵，有著本國的特殊性，較強調個體是否承擔過多的情感性照顧及其心理感受是否覺得不公平，這二個指標可能與不良的身心健康有著更密切的關係。本研究結果呈現出似乎只要降低「情感性照顧」和「不公平性」，暫不論個體「功能性照顧」的多寡，似乎可能就會有較佳的身心健康狀態。就如 DiCaccavo（2006）所提出情緒性的親職化現象被認為對孩子的健康有較大的威脅；Jacobvitz 與 Bush 也發現父母若從孩子身上尋找親密感而不是由配偶身上尋求，會發現母女聯盟常常與孩子成年後的焦慮有關，而父女聯盟則常與孩子成年後的憂鬱有關（引自 Earley & Cushway, 2002）。若大學生心理上擔憂家庭成員需要他情緒上的支持，甚至是父母間的衝突關係需要他去調解的時候，可能會讓大學生感到心力疲乏。況且，父母間的情緒支持和調解本來就不是依賴孩子就能夠處理與解決的。當家庭裡父母間有太多情緒需求需要依賴孩子去照顧時，自然地，父母也就無暇提供相當的照顧和關心給他的孩子。如此，孩子的付出與照顧將不被看見，漸漸的孩子可能產生了不公平的感受。Barnett 與 Parker（1998）亦指出在早期親子界限不清時，女孩被期待去迎合母親的需求、試著去調停婚姻中的衝突、成為家中的和平製造者和照顧者，以致成年後的女性顯現出較多憂鬱和低自尊的狀態。當孩子付出越多的情感性照顧，且不公平的感受日漸增多時，孩子即常常感到矛盾的心理衝突。相關文獻支持了本研究的結果：若個體在家中擔任較多情緒性照顧、父母從孩子身上尋找親密感及調停父母婚姻的衝突等，常常容易使得孩子有較差的身心健康。

三、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之典型相關結果

本節主要分析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之間的關係。本研究分別以親職化量表之「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與「不公平性」作為 X 組變項，以個體化量表之「功能獨立」、「態度獨立」、「情緒獨立」、「衝突獨立」與「人我分化」作為 Y 組變項，進行典型相關分析，其結果如表 3 所示。

表3 大學生親職化量表各分量表分數與個體化量表各分量表分數之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χ_1	χ_2	χ_3		η_1	η_2	η_3
功能性照顧 (X_1)	-0.18	-0.19	-0.97	功能獨立 (Y_1)	-0.65	.46	.33
情感性照顧 (X_2)	.13	-0.95	-0.29	態度獨立 (Y_2)	-0.69	.31	-0.23
不公平性 (X_3)	-0.97	-0.21	-0.16	情緒獨立 (Y_3)	-0.71	.69	-0.01
				衝突獨立 (Y_4)	.58	.75	-0.03
				人我分化 (Y_5)	-0.12	.53	-0.52
抽出百分比	.33	.33	.35	抽出百分比	.35	.33	.09
重疊百分比	.21	.04	.01	重疊百分比	.23	.04	.002
ρ^2	.65	.11	.03				
P	.81*	.34*	.17				

* $p < .05$

表3 結果顯示，有二對典型變項之相關達顯著水準 ($\rho_{\chi_1\eta_1} = .81$, $p < .05$ 、 $\rho_{\chi_2\eta_2} = .34$, $p < .05$)。從典型相關強度指標 ρ^2 分別為 .61 和 .11 來看，第一對典型變項之間的關係強度較第二對典型變項關係高。

(一) 大學生親職化各分量表分數與個體化各分量表分數之第一對典型相關結果

在第一對典型相關中，典型變項 χ_1 與「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及「不公平性」分量表分數的相關係數分別為-.18、.13 和-.97。另外，典型變項 η_1 與「功能獨立」、「態度獨立」、「情緒獨立」、「衝突獨立」及「人我分化」的相關係數分別為-.65、-.69、-.71、.58 和-.12。

從兩側的典型結構係數來看，典型變項 χ_1 是跟「情感性照顧」分數呈現微弱正相關，跟「功能性照顧」分數呈現微弱的負相關，但跟「不公平性」分數呈現較大的負相關。而典型變項 η_1 跟「功能獨立」、「態度獨立」、「情緒獨立」分數呈現較大的負相關，與「人我分化」分數呈現微弱的負相關，但與「衝突獨立」分數呈現明顯的正相關。從關係的方向上來看，可以推測左側親職化的各個分量表分數與右側個體化程度的各個分數在第一對典型變項間所呈現的關係方向是交互呈現的狀態。再從結構上來看，典型變項 χ_1 概念上與親職化概念應不是直接的關連，典型變項 η_1 也不是一個完全個體化的概念。典型變項 χ_1 是一種高「不公平性」傾向，而典型變項 η_1 是一種高「功能獨立」、高「態度獨立」、高「情緒獨立」、中度「人我分化」和低「衝突獨立」傾向。而此兩典型變項 χ_1 與 η_1 之間是存在著相當程度的相關。

本研究結果呈現出：當大學生近似親職化現象呈現高度「不公平性」時，其近似個體化之「功能獨立」、「態度獨立」、「情緒獨立」與「人我分化」程度較高，但「衝突獨立」程度較低；亦即大學生心理感受到高度不公平感時，儘管負擔家務和照顧家人的情緒較少，其外在行為表現在功能、態度和情緒上是獨立自主的，且能由父母的關係裡獨立出來，但其內心與父母情感分離的衝突還是大的。換句話說，大學生感到較多自己不被瞭解、缺少支持，以及付出與獲得間是不對等的時候，即使大學生外在表現似乎顯現出較多的獨立性但內心常常仍是矛盾衝突的。

上述現象是可以理解的，大學生的年紀已經到了準備離家獨立的階段，值此階段的大學生在自我角色定位的同時，常會思考自己在家庭的定位與角色意義。蔡秀玲（1997）指出青少年離家上大學，正面臨生理與心理分離的掙扎。大學生需學習從過去的生活方式、生活目標及情緒依賴中，慢慢地轉為獨立自主，然而面對環境中的壓力與挑戰，大學生又渴望得到父母親的照顧與關愛，介在此種依賴-獨立的掙扎中，產生許多內心的衝突與心理困擾。Teyber（2011）指出依附關係的滿足是個體基本的需要，儘管大學生的外在看似堅強獨立，但介在依賴-獨立的掙扎中，其仍舊常常會對從與父母的關係獨立出來感到矛盾，所以大學生在個體化的過程中能獲得父母的瞭解與支持是重要的。若大學生在家庭裡感到不被瞭解、缺少支持時，可能會轉而向同儕尋求認同與支持，此時的大學生有能力在態度、想法、實際能力上從家中獨立出來，去追尋他想要的被瞭解與被照顧。若父母忽略了他們的付出與照顧，儘管大學生能夠尋求同儕支持，但大學生可能還是在與父母的關係中有著怨恨、焦慮、生氣等負面情緒。

(二) 大學生親職化各分量表分數與個體化各分量表分數之第二對典型相關結果

在第二對典型相關中，典型變項 χ_2 與「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及「不公平性」分量表分數的相關係數分別為-.19、-.95 和-.21。另外，典型變項 η_2 與「功能獨立」、「態度獨立」、「情緒獨立」、「衝突獨立」及「人我分化」的相關係數分別為 .46、.31、.69、.75 和 .53。

從兩側的典型結構係數來看，典型變項 χ_2 是與「情感性照顧」分數呈現較明顯的負向關係，與「功能性照顧」和「不公平性」分數呈現較小的負相關。而典型變項 η_2 普遍地與每一個個體化程度有一定程度的正向關係。從關係的方向上來看，典型相關係數必然是正的，可以推測左側親職化的各個分量表分數與右側個體化程度的各個分量表分數是呈負的關係，也就是反向的關係。從結構上來看，典型變項 χ_2 概念上應該是親職化現象的概念，而典型變項 η_2 呈現是個體化的概念。因此，第二對典型變項 χ_2 與 η_2 間的典型相關係數應該是相當程度可以代表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之間的關係，也可以推論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是相關的。

本研究結果顯示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有顯著的關係：當大學生承擔較多的家務責任、情感照顧責任和感到較不公平時，則個體化程度就越低。從研究結果中，可進一步觀察到，若大學生出現較多親職化行為中的「情感性照顧」時，則其個體化程度越低，越不能從父母處在功能、態度、情緒和情感層面獨立出來，及越需要藉由順從他人或依賴他人來獲得自我價值感，較難獨立判斷，也會因為別人的批評而感到脆弱。相關文獻支持了本研究結果，Burt 及 Jones 指出親職化程度高的女性，當她對他人較沮喪時，較容易減損人際能力，也較難從家庭裡面分離-個體化（引自 Wells & Jones, 1998）。此外，Castro、Jones 與 Mirsalimi（2004）表示親職化現象常常會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個體化和自主性，以及影響成年後的憂鬱現象和依賴需求的矛盾感。本研究與相關文獻結果，皆指出親職化現象越高，越會影響孩子從家庭中獨立出來的能力。但本研究結果似乎又更強調親職化現象中情感性照顧對個體化不利的影響。

邱秀燕（2000）也指出若親子之間的情感過於黏著，個體未能解決與父母的強烈情感依附，常容易以情緒割斷的方式以求個人的獨立，但其內心常又十分期待情感的親密連結，可是卻常常又表現極端厭惡而逃避之，這種情感的趨避衝突常導致其變動且膚淺的人際關係。此外，蔡秀玲（1997）的研究指出大學生所面臨的個體化發展任務與適應有關，尤其對個體的情緒適應影響最大，其表示個體化確實對個體內在心理常常有正向意義。由此可知，大學生的情緒問題，部分可能是源於個體化的掙扎，所以大學生的個體化任務亦顯重要。當大學生需要照顧家人的情緒、擔任家中衝突的協調者與和平維護者，大學生可能會覺得家庭中的衝突，自己有責任去調停與處理，儘管大學生已經到了需要學習獨立於家庭去發展社交與擴展生活的階段，大學生仍舊常會牽掛家庭的衝突氣氛，以及家庭需要他的程度，將家庭的需要優先於自己獨立的需要，因此難以從家庭中成功地獨立出來，進而連帶影響大學生的適應與情緒問題，形成惡性循環。因此，若大學生承擔太多家庭或父母情感性的責任，或者與親子間的情感過於黏膩時，在情感上與家庭或父母形成界限不清的時候，常會影響大學生獨立自主的程度。所以在大學生個體化的過程中，應多注意其在家庭中承擔照顧家人情緒的責任以及捲入家庭衝突的程度。

綜合上述討論，當大學生有越多的不公平感時，其越容易呈現「內心矛盾衝突但外在獨立」的樣態；當大學生有較多的情緒照顧責任時，其個體化程度就越低。此外，研究者從本節研究結果與上述第二節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的研究討論中均發現大學生照顧家人的情緒責任與內心感到不公平的情緒感受，對大學生身心健康指標與個體化程度似乎有較密切的關係存在。

結論與建議

一、台灣的大學生親職化現象是否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男生在親職化現象中的「不公平性」高於女生，其餘「功能性照顧」、「情感性照顧」則無明顯差異。然而，在親職化現象是否有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中，因為本研究在抽

樣時男女比例失衡(男:女 = 116:171),因此限制了本研究結果推論的範圍。建議在未來研究時,盡量取得男女生比例的平衡;此外,亦可以深入的去瞭解男性親職化行為的表徵與女性親職化行為的差異點,以及男性感到不公平的可能原因。在性別平等口號大力的鼓吹下,性別之間的平等與文化期待如何影響女性或男性在照顧行為的改變與差異也是值得進一步的探究。

在輔導應用的部分,研究者建議(1)可多增加大學生的覺察能力,以釐清大學生在家中的角色地位,探索內心的意義、想法與感受;(2)協助大學生如何適時的在照顧家人與表達自身的需求間找尋平衡點及(3)學習適當的宣洩情緒,減低不公平的感受,使大學生有較平衡的感受。

二、台灣的大學生親職化現象因出生序是否有明顯差異

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的大學生出生序在親職化現象的「功能性照顧」變項中,呈現老大高於老么的結果,然而老大與中間子女、獨生子女的差異並不顯著;另外在「情感照顧」及「不公平性」則都呈現不顯著的結果。本研究結果與其他相關文獻相似,然而由於出生序與親職化現象之間的關係,仍會因為出生序這個變項會受到性別順序、手足年齡差距、家庭不利條件以及家庭環境與結構等因素的影響而有所差異,故此一主題仍需要做進一步地深入探討。

就輔導應用上的建議而言,當父母給予家中排行老大的大學生家務照顧責任時,亦要重視及了解其情緒感受與需求,讓他們也有機會說說心中的壓力和疲勞,抒解心中的矛盾與不公平感,並獲得來自父母的鼓勵與肯定。當同等的照顧與支持回應給他們時,可能較會使提供家庭功能性照顧的長子、女有更佳的身心狀況。此外,家務照顧責任宜均分給每個小孩,讓每個孩子都有機會學會精熟家務的能力(Stein et al., 2007),而非只由長子、女來承擔一切家庭的重責。

三、台灣的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其身心健康指標的關係

本研究所謂的親職化現象,乃採取國外對親職化現象的定義為:個體同時具有「高功能性照顧」、「高情感性照顧」與「高不公平感」三個現象,但本研究結果並未呈現出此三者皆高,即同方向的關係走向,而呈現出來的關係是:若個體「低功能性照顧」、「高情感性照顧」與「高不公平感」時,則大學生的身心狀況就較差。Gough 與 Stanley (2004)認為應該加強父母的親職化教育能力,要能夠平衡父母本身和孩子的需求,以照顧孩子的身心健康。父母本身若有情緒問題,應尋求親友、同儕或專業心理輔導人員,解決自身問題,而非從孩子身上尋求孩子的照顧與慰藉。

本研究使用張珽(1987)所編製的一般健康量表的測量工具,雖廣為應用,然其內部一致性係數介於 .47~.72 之間,係數偏低,信度尚有不足,可能會影響本研究結果,未來研究可設法避免此一因素的干擾與限制。此外,本研究結果與石芳萌(2007)的研究,似乎都未顯現出符合國外定義的親職化現象,故後續研究,建議進一步透過深入訪談,期待能夠更瞭解國內親職化的內涵,也可以深入探究華人的孝道文化與親職化現象的關係,並進一步瞭解並找出是否因不同文化的差異,造成親職化內涵上的差異。

四、台灣的大學生親職化現象與其個體化程度的關係

大學生的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之間有二個關係組型存在:第一個關係組型呈現出大學生覺得因承擔照顧責任而感到犧牲、不被瞭解、缺少支持、付出與獲得間不對等時,會呈現「外表獨立堅強、但內心似乎仍衝突矛盾與不平」的現象;其次,第二個關係組型,本研究結果顯示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有顯著關係,當大學生承擔較多的家務責任、情感照顧責任和感到較不公平,尤其承擔越多家人情緒的責任時,則個體化程度就越低。

此外，本研究僅發現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指標有關係存在，以及親職化現象與個體化程度有關係存在。另從蔡秀玲（1997）的研究結果瞭解個體化程度與個體的身心適應有關，然而，本文對個體化的高低是否與親職化和身心健康兩者有關係，則尚未討論。因為本研究發現情緒性的親職化現象與較差的身心健康有關，又 Broszormenyi-Nagy 與 Spark（1973）及 Jurkovic（1997）皆認為有適應性親職化的現象，因此建議未來可研究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兩者之間，是否有中介因素可能減緩親職化現象的負向衝擊，例如：探討個體化程度在親職化現象與身心健康指標之間是否扮演著中介的角色；或是有其他中介因素減低親職化對孩子的負向影響，讓被親職化的孩子除了可以協助家庭能順利運作之外，亦可讓自身有較佳的身心發展。

參考文獻

- 王珮玲（1987）：**高中聯考壓力與國中生身心健康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Wang, P. L. (1987). *Anticipatory Examination Stress on Health of Adolesc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Taipei.]
- 石芳萌（2007）：**高中職學生親職化、自我分化與身心健康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Shih, F. M. (2007). *A Correlational Study on Parentification, Self-Differentiation, and Health for Students in Senior High and Vocational High Schools in Taiwa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Taipei.]
- 石玲惠（2004）：**國小高年級學童知覺婆媳孫之三角關係與情緒困擾之相關研究**。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院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Shih, L. H. (2004). *High grade pupils in primary school sens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riangulation of mother in law daughter in law, and grandson and the emotional disturbanc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Chiayi.]
- 邱秀燕（2000）：**青少年家庭系統分化、心理分離-個體化、自我發展及情緒適應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Chiu, S. Y. (2000).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amily System Differentiation,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Self-Development and Emotional Adaptation in Adolesc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Taipei.]
- 張虹雯（1999）：**父母爭吵時的三角關係運作與兒童行為問題之相關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Chang, H. W. (199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iangle Operation During Parental Quarrels and Behavior Problems Among Children of Elementary School*.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Changhua.]

- 張珪 (1987)：大專聯考壓力症候群的探討。*中華民國公共衛生學會雜誌*，6(3)，43-55。[Chang, C. (1987). Study on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tress Syndrome. *Journal of National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 Republic of China*, 6(3), 43-55.]
- 惠風 (1995)：大學生原生家庭經驗、心理分離-個體化與情緒適應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Huei Feng. (1995).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riginal Family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Separation-Individuation and Emotional Adaptation in University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Taipei.]
- 葉致芬 (2004)：孝悌楷模的家庭系統運作。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Yeh, C. F. (2004). *The Family System Operation of Filial Piety Model*.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Changhua.]
- 廖若君 (2004)：單親家庭青少年家務參與—以台北縣市中等學校學生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碩士論文。[Liao, J. C. (2004). *The Household Labors Participation of the Adolescents from Single Parent Famil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Family Studies master's thesis, Taipei.]
- 蔡秀玲 (1997)：大學男女學生依附關係、個體化與適應之相關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Shih, S. L. (1997).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ttachment, Individuation and Adaptation in Male and Female University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Taipei.]
- 管貴貞 (1992)：單親青少年的壓力因應策略及其社會適應之研究。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Guan, G. Z. (1993). *The Research on Stress Coping Strategies and Social Adjustments*. Tunghai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master's thesis, Taichung.]
- 蔣桂嫻 (1993)：高中學生生活壓力、因應方式與身心健康關係之研究。國立高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Chiang, K. M. (1993). *The Relation among Stress, Coping and Health of Senior High Students*.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master's thesis, Kaohsiung.]
- 鄭淑君 (2002)：夫妻婚姻滿意度與其子女三角關係運作情形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Cheng, S. C. (2002).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 and Parent-Child Triangulation*. National Changhu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master's thesis, Changhua.]
- 劉芳助 (1999)：誰來照顧這群隱形的病人—被遺忘的女性家庭照顧者。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Liu, F. J. (1999). *Who Cares for the "Hidden Patient"—the Female Family Caregive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master's thesis, Taipei.]

- Arnold, F., & Kuo, E. C. Y. (1984). The value of daughters and s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ender preference of parent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15(2), 299-318.
- Anderson, S. A., & Sabatelli, R. M. (1990). Differentiating differentiation and individuation: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 challeng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18(1), 32-64.
- Barnett, B., & Parker, G. (1998). The parentified child: Early competence or childhood deprivation.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Review*, 3(4), 146-155.
- Braverman, D. G., Good, G. E., Robertson, J. M., O'Neil, J. M., Fitzgerald, L. F., Stevens, M., DeBord, K. A., & Bartels, K. M. (1995). Male gender role conflict: Psychometric issues and relations to psychological distres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42, 3-10.
- Broszormenyi-Nagy, I., & Spark, G. M. (1973). *Invisible loyalties: 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therapy*. Hagerstown, MD: Harper & Row.
- Burton, L. (2007). Childhood adultification i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A conceptual model. *Family Relations*, 56(4), 329-345.
- Byng-Hall, J. (2002). Relieving parentified children's burdens in families with insecure attachment patterns. *Family Process*, 41(3), 375-388.
- Castro, D. M., Jones, R. A., & Mirsalimi, H. (2004). Parentification and the impostor phenomen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2, 205-216.
- Davies, P. T. (2002). Conceptual links between Byng-Hall's theory of parentification and the emotional security hypothesis. *Family Process*, 41(3), 551-555.
- DiCaccavo, A. (2006). Working with parentif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clients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ists.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79, 469-478.
- Earley, L., & Cushway, D. (2002). The parentified child.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 7(2), 163-178.
- Godsall, R. E., Jurkovic, G. J., Emshoff, J., Anderson, L., & Stanwyck, D. (2004). Why some kids do well in bad situations: Relation of parental alcohol misuse and parentification to children's self-concept. *Substance Use and Misuse*, 39(5), 789-809.
- Gough, D., & Stanley, N. (2004). Parenting capacity. *Child Abuse Review*, 13, 1-4.
- Jennifer, K., & Rebecca, N. A. (2007). Family experiences and self-criticism in collegestudents: Testing a model of family stress, past unfairness, and self-estee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5(5), 447-457.
- Jones, R. A., & Wells, M. (1996). An empirical study of parentification and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4(2), 145-152.

- Jurkovic, G. J., Thirkield, A., & Morrell, R. (2001). Parentification of adult children of divorce: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0*(2), 245-257.
- Jurkovic, G. J., & Thirkield, A. (2000). *Filial Responsibility Scale-Adult*. Available from Gregory Jurkovic, Dept. of Psychology,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1 University Plaza, Atlanta, GA 30303.
- Jurkovic, G. J. (1997). *Lost childhood: The plight of parentified child*. Philadelphia, PA: Brunner/Mazel.
- Maysseless, O., Bartholomew, K., Henderson, A., & Trinke, S. (2004). "I was more her mother than she was mine": Role reversal in a community sample. *Family Relations, 53*, 78-86.
- Patricia, L. E. (2010). Children's provision of family caregiving: Benefit or burden? *Chil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4*(1), 55-61.
- Stein, J. A., Rotheram-Borus, M. J., & Lester, P. (2007). Impact of parentification on long-term outcomes among children of parents with HIV/AIDS. *Family Process, 46*(3), 317-332.
- Tatjana, A., & Gabriele, W. (2010). Family caregivers: Gender differences in adjustment to stroke survivors' mental changes.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y, 55*(2), 159-169.
- Teyber, E. (2011). *Interpersonal process in psychology* (5th ed.). CA: Belmont Brooks/Cole.
- Walker, J. P., & Lee, R. E. (1998). Uncovering strengths of children of alcoholic parents. *Contemporary Family Therap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4), 521-538.
- Wells, M., & Jones, R. (1998). Relationship among childhood parentification, splitting, and dissociation: Preliminary findings. *The American of Family Therapy, 26*, 331-339.

收稿日期：2010年11月15日

一稿修訂日期：2011年04月19日

二稿修訂日期：2012年02月29日

三稿修訂日期：2013年01月18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3年01月21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3, 45(1), 103-120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Parentification, Individuation, and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Hui-Shan Chen

Taipei City
Song-Shang Municipal
Senior High School

Li-Chuan Wu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arentification, individuation, and gener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A total of 287 students from colleges i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Participant completed a questionnaire composed of "Parentification Scale", "Individuation Scale", and "General Health Scale". The obtained data was analyzed by MANOVA, Pearson's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canonical analysi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as follows: (1)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gender difference on parentification, with men scor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unfairness" than women. There was also a significant birth order difference on parentification, with oldest children scor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youngest children on "instrumental care-giving". (2) Canonical analysis revealed on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canonical variate of parentification and health. Less instrumental care-giving, more emotional care-giving and more unfair treatments were associated with worse health. (3) Parentification wa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ndividuation. We found tw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between canonical variates of parentification and individuation. The first one showed that more unfairness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ore attitudinal independence, more emotional independence, but less confliction of independence. In the second one, more emotional caring for the family was associated with lower individuation.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e discusse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ing and parent education.

KEY WORDS: birth order, college students, gender, health, individuation, parentification.